



这幅日军登城的照片既是济南古城之殇的再现,也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3月20日成立)汪精卫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平统一”,于8月19日“迁都南京”,史称宁汉合流,但京津、直隶、东北等仍为奉系军阀所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大业”或者说为了击退奉系军阀,1928年4月5日在徐州誓师组成北伐军,决定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军阀进行讨伐,史称“第二次北伐”。

北伐军开局顺利,但在即将进入山东地界时遇到了日本阻挠——日本一向认为山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战之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就曾有所谓“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转交给日本”的提案,并因此引发了波及全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北伐之前日军在济南已驻有军队——率先向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建议出兵山东的就是日本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佐。

日本对国民政府北伐是有预判的。国民政府的策略是“交涉”和“斡旋”,即不与日军发生直接“冲突”。

1928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曾致电蒋介石,“请于军事进行,注意胶济路沿线日本侨民利益”。4月23日,国民政府委任蔡公时战地外交主任,蔡公时随即“分函驻沪各国领事,声明国民革命军对战地各友邦侨民将尽力保护”。4月19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召集内阁临时会议,以“山东形势急转,内乱将波及日侨,出兵纯属自卫”为由,通过了出兵山东决议。

4月25日,在黄郛的指示下,驻日本东京特派员殷汝耕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此人即二战结束后被远东国际法庭认定的十四名甲级战犯之一)。松井表示,“日侨集中济南城西商埠区,遇有紧急情况,当撤至保护区内”,“希望”北伐军“勿与日军冲突,免计划成泡影”。日本政府还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与北京北洋军阀政府送来“觉书”(类似于备忘录),表示出兵旨在保护日侨,“一

俟战争停止,即当撤退”。

而此时日本集中在青岛的军舰已有32艘!再说,中国军队在自己领土上活动,日本何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这不是诡计么?

北伐军于4月30日对济南发起了总攻,次日即克复济南。但日军第十一旅团司令斋藤声称“无论何军闯入日军警戒区内,一律勒令缴械”,在城外商埠区设立沙包、铁丝网等防御工事。

为息事宁人,5月2日,刚上任的济南卫戍司令方振武会晤斋藤时再次声明“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3日上午9时,北伐军第四十军宣传队在四大马路纬一路口魏家庄张贴标语时,日军无理开枪射击,击毙军民十余人,并非常残忍地杀害了国民政府驻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17人——蔡公时在济南上任首日便遇难!日军不顾外交礼仪烧毁了黄郛办事处,并用大炮轰击北伐军,先后杀害我军民一千余人。史称“五三”惨案。

当夜,获悉情况后的蒋介石与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等会商后决定分兵渡过黄河,绕道北伐,日军判断在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和国安军难以抵挡,便趁火打劫,欲在张作霖败退北京之前逼其“解决满蒙诸悬案”,包括签下由“满铁”在东北兴建满铁支线的合同,以前“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时事新报》语),但张作霖仗着自己手里有几十万军队念起“拖字诀”。

此前,日本人已与张作霖结下“梁子”。1925年11月,奉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结成同盟发动兵变,张作霖非常狼狈,日本关东军与张作霖达成“密约”:关东军出兵援张平叛,张口允诺承认“二十一条”。最终郭松龄兵败遭俘被枪决,待兵变平定后关东军找张作霖兑现“承诺”时,张作霖“王顾左右而言他”,日本人很恼火。

1927年4月,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田中义一担任了日本首相。为了控制中国东北,他采

取对蒋利诱、对张施压的策略,以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本土”、同意北伐军通过济南为条件,换取他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对张作霖则频频要其兑现“密约”承诺,强索铁路权,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但张作霖始终未能全部满足筑路、开矿、移民等要求。不但如此,关东军认为张作霖还煽动军民反日游行,两万余人的游行队伍喊出了“打倒田中内阁”的口号。在日本看来,张作霖对其“东北权益”及“满蒙”问题非常不配合,就有了除掉他的想法。

在北伐军的攻势面前,张作霖于1928年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6月4日凌晨5点30分,他乘坐的专列被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重伤于当日在沈阳死去。史称“皇姑屯事件”。

一个月相继发生“五三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根源就是日本将中国东北视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入侵东南亚的大后方,欲长久控制东北。

1928年5月18日,日本驻华使节在“觉书”中郑重其事地提到,“满洲治安之维持,在我国极为重要。”“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后来成立伪满洲国就不难理解了。在1945年日军战败前夕,日本仍坚持“宁愿放弃东京,也不放满洲”的说法。所以,日本制造“五三惨案”看似阻挡国民革命军北伐,实则是向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施压,既避免其力量进入东北,也逼其承认日本对东北的控制;炸死张作霖是因为他不“配合”关东军对东北特殊权益的要求。二者殊途同归,实则是一回事。



华不注投稿邮箱:
qlwbhzb@163.com

『五三惨案』背后的角力

带来更多的思考与不一样的感受——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等更宏大背景下解读这段令人心痛的历史,或许能给读者历史。本文试图将历史的维度拉得更长一些,将『五三惨案』置于日本觊觎东北、每年的5月3日,济南市民都会自发地来到『五三惨案』纪念馆缅怀先烈,重温

【史海钩沉】

【宽厚所街忆旧】

塞风先生在这里教我写诗

□韩庆祥

上世纪70年代,我迷恋上了写诗,每天都要写出一两首诗歌才能入睡,那个时期像粉碎“四人帮”庆祝游行啦,毛选五卷出版啦,党的十一大召开啦,几乎所有的大事我都用诗歌记录下来。但是因为我没有机会系统学习,我的诗歌也不过是“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谁怕谁”的顺口溜水平,大部分只能登在车间的黑板报上。

1977年11月,我去宽厚所街22号院串门,跟老同学也是书画家的鲁敏谈到写诗的困惑和困境。他说后院里就有一位老诗人,姓李,名根红,笔名“塞风”,咱上门请教吧。于是,我跟着他抬腿就往后院走。

这是个东西大的大杂院,鲁敏住在前院,往里走,还有个套院。听到叩门,先生从北屋里迎出来,他看上去五十多岁,挺拔结实,浓眉下,眼睛炯炯有神,总是笑着说话。得知我喜欢写诗,先生答应看看我写的东西,还告诉我,历下区文化馆要办文学讲座,请他去讲诗歌创作,让我抓紧报名。

历下区文化馆在解放阁对面,是一座老建筑,距离先生家不过二百来米。《写作知识学习班》是11月11日开课的,持续5个月。张振声老师以及塞风的夫人李枫老师都给大家讲过课。由于当年10月刚刚恢复高考,人们的求知欲仿佛一夜间被激活了,各个行业的青年人就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似的涌向文化馆去听讲座,去晚了连座位都没有。每逢周五下班后,我把两岁的儿子交给妻子,骑自行车紧蹬半小时赶去文化馆,指望能坐在前排听课。

塞风先生性情豪爽,讲课嗓门洪亮,那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挺悦耳。他自我介绍说是河南灵宝人,老家离三门峡很近。少年时代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6岁就发表了“面对东北角/早已义愤填膺/我拉圆/大地的弓”的著名诗句;他说写诗要有气魄,他用“地球像一张张开的弓,向着苍天射出愤怒的箭”表达抗争精神;他1940年就奔向延安,写出“天上云雀有家,革命者的心没有家”来抒发壮志……先生在讲台上诗情洋溢,用亲身实践来讲述诗歌理论和写诗技巧,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看到塞风先生那么赤诚率真,同学们都希望得到他进一步的点拨,如永长街小学的语文教师胡安仁,还有一位在包头兵工厂回来探亲的诗友徐书贵,和我一起带上诗稿登门拜访。过了几天,先生回我满满的三页信笺,开头说:“一口气读完了您128首短诗,它们能吸引住我,证明了诗的魅力”,他要我在诗的语言、题材和构思方面下功夫,信末写道“愿更深处掘取诗的题材,像钉子一样入木三分,从数量中提高质量。因节后赴京,忙乱非凡,仅供一管之见。希常来玩,共同探讨诗的道路。”诗人塞风那么大的名气,却对无名之辈如此关爱,让我如沐春风。

塞风先生教我写诗,不但给我开“小灶”,还鼓励我在学习班上朗诵自己的新作,他说诗人都应该激情满怀,放声歌唱。记得那堂朗诵课上,我走上讲台,心里咚咚直跳,看到先生鼓励的笑容,就壮着胆子亮开嗓门,朗诵起自己写的《黄河的怀念》:“脚踩彩云啊,我溯流寻踪;心飞河汉啊,我喊遍苍穹:周——总——理——”朗诵结束,先生带头为我鼓掌。这首诗还登上了当年业余作者梦寐以求的大报——大众日报《丰收》副刊(1979年3月4日)。

在塞风先生推动下,历下区文化馆出了《历下文艺/诗专号》(1978/15期特刊),16开本总共14页,选登了20多位同学朗诵的诗作。刊物封面用红色的字体,配图是解放阁(那时解放阁还没有加盖现在的楼阁,仅有基座)。在那没有电脑也没有中文打字机的年月,区文化馆的刊物也只能用手刻蜡版,现在这种油印的东西已经见不到了。这些年,我虽然多次搬家,也添置了不少新书,但这本《历下文艺》仍然完整地珍藏在我的书橱里。

宽厚所街,留下我学诗的足迹,每当路过宽厚所街,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塞风先生。如今,整条宽厚所街和历下区文化馆都被夷平改建,华美的“宽厚里”牌坊像新贵似的兀立着,标示着这里就是那条回不去的老街,但在我心底的胶片上,宽厚所街有我永远也抹不去的经历和记忆——塞风先生教我写诗。

塞风先生辞世12年来,省内外报刊发表了很多追忆和纪念文章。我建议如今的宽厚里将老街当年的各界名人刻碑勒铭,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城市新貌交相辉映。

□韦钦国